

人文
学术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审美意识的现代化

吴中杰 著

Modernization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復旦大學 出版社

丛书主编 朱立元 曾繁仁

执行主编 李 钧

吴中杰 著

审美意识的现代化

Modernization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美意识的现代化/吴中杰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6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1399-0

I. 审… II. 吴… III. ①文艺美学-中国-文集②鲁迅著作(1881~1936)-文艺思想-文集
IV. ①I01-53②I210.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0580 号

审美意识的现代化

吴中杰 著
责任编辑/毛蒙莎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0.25 字数 315 千
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399-0/I·912
定价: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受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着手组织“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一开始,我们就想起了十多年前由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那套大型丛书先后出版了三十余位当代中国著名文艺理论家自选的论文集,可以说是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和检阅。“丛书”从2000年第一辑(六本)出版起,已经过去了十五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又有了巨大的进展,文艺理论的建设也继续经历了激荡起伏的进程。现在再编辑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可能历史和现实的语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考虑到出版周期的原因,“文库”计划先期出版十二本。当前中国文艺理论界有成就、有影响的知名学者远超这个数字,所以我们只能优先考虑“三〇后”“四〇后”学者加盟这套“文库”,但即便如此,目前只能有十二位学者入选,还是难免挂一漏万,这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也期待在以后的时间里再能陆续出版。

入选“文库”的这十二位学者,基本上都是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全程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的理论文集,记录着每一位作者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所感受到的深切体验,所获得的宝贵感悟,所留下的坚实脚印,以及靠着艰辛耕耘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虽然无法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成果,但至少也可以折射出它的部分光影,勾勒它的大致轨迹,对今后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或有些许参照价值,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的缘由。

如果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作一个大致分期的话,我们认为,可以分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令后来者怀想的年代。启蒙的激浪,保守的潮汐,新生的欢欣,怀旧的惆怅,都错综复杂地交织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心灵。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文学正名”“回归文学自身”的呼吁,冲破了长期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充当政治工具的禁锢,重新发现和

肯定了文学的审美本性；学界学习马克思《巴黎手稿》引发的人道主义、人性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以确立；声势浩大的“方法论热”和稍后的“文学主体性”问题全国大讨论，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文学本质的重新思考先后形成了“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初步框架，为学科在90年代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而贯穿上述种种理论探讨、展示时代气象的主线，则是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充满了争议的碰撞和交融。这一时期，文艺理论界的思想解放集中体现为观念方法的更新和思维空间的拓展。虽然当时及以后批评嘲讽之声不绝，但作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和一代学人的亲身经历，它实际上塑造了文艺理论家们不同于以往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较之于他们的具体理论成果更为重要的。

经过新时期前十年的理论积淀后，90年代的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新阶段。随着西方现当代文论思想被积极引介到中国，一种迫切想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的现代性冲动也成为国内文艺理论家们挥之不去的情结。90年代初期，后现代主义同时以哲学和文论的名义登陆国内理论界，就是一个富于意味的信号。由此带来的研究格局也显得流派纷呈，思潮更迭，这是转型期中国在学术文化领域内的必然表征。90年代最值得关注的是1994年前后国内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其主阵地尽管不在文学理论领域，但最初发动是在文学界。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大潮勃兴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精英文化形成巨大冲击，造成文学创作中“人文精神失落”的现实危机，引发了理论界（包括文艺理论界）的广泛反思，由此才催生出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人文使命等一系列话题。经过这场大讨论，文艺理论界的研究探索在多个向度上向纵深发展：对文学本质的探讨有了新的进展，“审美意识形态论”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成为文学理论建构中深层次的思考；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译介、研究以及批判性的吸纳始终在争议中前行；与此相关，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话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当今；90年代末，文艺理论界站在世纪之交的制高点上，对整个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五十年文艺学的流变历史和经验得失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历史的反思，寻找继续前进的正确路径……整个90年代，中国文艺学在新的经济社会语境中闯出了多元发展的可喜局面，如心理学、生态学、接受理论、诸种现代语言学、人类学、比较文化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和解构

主义、哲学解释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学说和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批评方法不断涌入,并与中国文学理论传统既相冲突又相融合,进而广泛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论的多元化展开,有些研究方法还推动了文艺学新学科或学科新分支的建立,如文艺心理学、生态文艺学、文学修辞学、文学人类学、文学解释学、文学叙事学等,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学理论话语和学科形态的建设,使之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时代终于进入 21 世纪。全球化进程在加快,现代性焦虑在趋深,中国文学理论又迎来一个充满生机的新发展阶段。文化研究蓬勃兴起,冲击着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格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视像文化的异军突起,“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主张的提出,在短短几年里迅速转移着学界的注意力,成为新一轮文艺学关注和争鸣的兴奋点;与此相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下,围绕文学本质问题,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掀起新的波澜;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尤其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成为越来越多的文艺理论家的自觉追求;对西方文论借鉴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冷静和辩证,盲目崇拜、亦步亦趋的现象明显减少;“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从 90 年代偏重于理论的探讨转向了务实的尝试和实践,在古代文论与基础理论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做出了可喜的实绩;文学基本理论的创新建构和文艺学教材的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着文艺理论界多数学者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网络文学的迅猛崛起,打破了原有的文学作品生成和传播的格局,向传统文学理论发起了挑战,成为当代文艺学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课题……比起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的文艺学发展显得更加沉稳,更加深入,更加扎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学的创新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突出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自觉努力贯穿于这三个时期的始终。我国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标准,从美学的和史学的,到人民的、美学的、历史的和艺术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进展和最高成就。由此可见,新时期三十多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健康的。那种把当代文艺理论要么看得危机重重、漆黑一团,要么说成完全是始终跟在西方文论后面亦步亦趋、搞全盘西化那一套的观点,是以偏概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所编辑的这套“文库”中的十二本论文集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当然,还远远不够

充分。钱中文、童庆炳两位先生在其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的总序中曾经预言，“一个理论创新的新世纪已经来临”，收入丛书的众多论文集，“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它们无疑将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21世纪的前十五年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编辑的“文库”，同样希望能够作为当代文艺学的一部分思想资料，“汇入新世纪的新的理论创造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参照、启示和借鉴。

“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文库”能够在我国人文学术著作出版困难重重的今天推出，实在是极为难得的。这里，我们必须专门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孙晶博士。是她首先主动向我们提出建议，出一套文艺学研究丛书。她的远见、魄力和眼光令人敬佩。在此，我们代表“文库”的十二位作者，向孙晶总编及复旦大学出版社有关编辑们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鼎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们不能不为“文库”的作者之一、我们敬爱的童庆炳先生的猝然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以他今年4月亲自编辑的论文集《文学：精神之鼎与诗意家园》的出版作为我们对他的纪念，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朱立元 曾繁仁
2015年国庆节

前 言

复旦大学中文系于1958年成立文艺理论教研室，其时我还在农村劳动锻炼，但编制已划归这个教研室了。次年回校，即到该室报到，开始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退休之后，不教课了，但由于习惯的作用，研究和写作仍在继续。算来从加入文艺理论队伍至今，已近六十年矣，可算是文艺理论界的一名老兵。

但是，我很少写抽象的理论文章。我的论文大都是结合文艺思潮的研究，或从文艺评论出发来探讨理论问题，这与时下文艺理论家们的写法有点不同。我之所以选择这条写作路子，是因为觉得这样写，更能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结合，更能面向文艺的实际。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委托曾繁仁教授和朱立元教授编辑一套国内学者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丛书，承蒙编者不弃，约我也出一本文艺理论论文集，我就从已出的各个集子中，选出一些理论性较强的文章，编成这个集子。

我在文艺理论研究中，着重探讨的是审美意识的变迁问题。因为时代的变化、社会上各种因素对文艺的影响，最终都会反映到审美意识上来。所以，在我所写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中，第一篇就是《五四精神与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而在我主编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中，特别强调的是从审美意识的发展角度来研究中国美学史。

但是，发思古之幽情，总是为了现在。无论研究古代的审美文化，还是研究现代的文艺思潮，都是为了推动当前的文艺发展。“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想上的一个大转折，就审美意识说，也体现了古今之嬗变，是现代化的开始。可惜后来却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未必完全出于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更重要的原因倒是由于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后来没有救亡使命了，而启蒙思想更变本加厉地受到批判，就可以证明。“五四”时期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我将它归结为四点：文体的解放，理性的感悟，个性的张扬和真实的追求。但是，一当“革命文学家”们将文艺当作普罗意识的宣传工具，这些现代审美意识就开始被扬弃，后来，革命领导者将文艺定位为政治的从属品，个

性主义、独立精神和写真实原则也就成为批判对象,而且,在不断批判中,确立了文艺创作要服从政治需要的原则,于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就培育出一批脱离生活真实性的虚假文艺,连文体也回到八股中去,当然,这是新八股、党八股,而不是老八股。所以,我认为,要推动中国文艺的发展,就必须回归“五四”,即重新转到审美意识现代化的轨道上来。

文艺理论是文艺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又要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学院化的倾向,是一种政治需要误导的结果。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应该从虚幻的学术殿堂中走出来,走到文艺实践中来。

本书分为四辑:第一辑是从现代文艺思潮的角度,分析审美意识的变化,主要选自《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第二辑着重从古代审美文化的角度,说明审美意识研究的重要性,主要选自《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中本人执笔的部分;第三辑集中论述鲁迅的文艺观点和美学思想,以及他在审美教育上所做的贡献,主要选自《鲁迅的艺术世界》和《鲁迅传》——鲁迅代表了我国新文艺的发展方向,但长期以来他的文艺观点却遭到了左右两方面的歪曲,了解其本来面貌,对新文艺的发展至关重要;第四辑着重讨论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和文艺学教材的编写方法问题,这是我在编写普通高校文科教材《文艺学导论》时的一些思考。

本书的编选,得到张岩冰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吴中杰

2014年10月25日

目 录

前言	001
----	-----

辑一 “五四”精神在现代文学中的兴衰

“五四”精神与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	002
开拓期的中国现代美学	021
口号之争与文学观念的分歧	034
文艺与政治的撞击	037
真实的流失与个性的毁灭	080
现实主义精神的最后挣扎	104
回归“五四”：中国文学的出路	122

辑二 审美意识的流变与美学史的发展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前言	138
原始绘画与图腾巫术	147
从“皇家的供奉”到“俗人的宠儿”	152
个性解放思潮与绘画上的革新运动	159
写意画与中国艺术传统	168
文艺鉴赏的审美特点	174
市场经济与市场文艺	188

辑三 鲁迅的文艺观与审美情趣

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	200
鲁迅论典型人物的创造	219
鲁迅论美、喜、悲	232
鲁迅与审美教育	249
鲁迅与书籍装帧	254
鲁迅：美的播布与创造者	260

辑四 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

对于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278
文艺学的创新与发展	287
谈文艺学教材的编写	
——致《文艺学基本原理》主编杨星映	295
文艺理论的学院化倾向	298
理论体系的建立与传播	
——序马驰《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	303
评一种批评逻辑	308

辑一 “五四”精神在现代文学中的兴衰

- ◎ “五四”精神与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
- ◎ 开拓期的中国现代美学
- ◎ 口号之争与文学观念的分歧
- ◎ 文艺与政治的撞击
- ◎ 真实的流失与个性的毁灭
- ◎ 现实主义精神的最后挣扎
- ◎ 回归“五四”：中国文学的出路

“五四”精神与现代审美意识的觉醒

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的运动，总是毁誉交加，有些人热忱地拥护，有些人竭力地反对；拥护和反对缺掉任何一边，就不成其为伟大的历史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运动一样，从一开始，就引起新旧阵营的交锋。陈独秀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而守旧派则恨不能食肉寝皮。

从1915年至今，已有一个世纪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仍有很大分歧：有些人认为“五四”运动促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有些人认为“五四”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而这种持续不断的争论，倒恰恰证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到底是文化新生，还是文化断裂，这要根据“五四”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情况来判断。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与“五四”以前的旧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五四”新文化战士也的确提出了反对传统文化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等等。但是，传统文化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它总是不断地吸收，不断地容纳，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造。先秦是诸子并峙、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代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时期儒家的道统被打断，玄学大盛；唐代吸取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宋明理学也非早期儒家本来的面貌，而糅合了许多佛道的东西……所谓中国文化传统，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何曾有什么一成不变、原封不动的东西存在！当旧的文化传统变成僵硬的外壳，阻碍民族的成长时，就必然会有新的文化因素来突破它。不是让现实去适应文化传统，而是传统文化必须将自己改造得适应现实的需要。判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过，不应以旧的文化传统为标尺去衡量它，而要以现实的需要为标尺去衡量它；不是看它是否与旧文化完全一致，而要看它根据现实需要而发展了什么、改造了什么、增加了什么。马克

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反过来说，出于一个国家的现实需要，必然会创造出一种适应这种需要的新理论。正是从这种现实的需要出发，先驱者才提出了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任务。鲁迅说：“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②他认为，中国人正是因为“粹”太多，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因而他深深地忧虑，怕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被挤出。鲁迅说：“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争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③批判旧文化和创造新文化，都是现实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生存的需要，因此形成一股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民主与科学，这是针对封建社会的专制与愚昧而提出来的，也是建设现代化社会所必需的文化思想。“五四”精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一股浩大的声势，冲击着传统的文化思想，给中国文化带来了生机。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个别的作品中，而且体现在整个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更新上，它使得中国文学跨出古代的历史门槛，走向现代，走向世界。

文体的解放

“五四”文学革命是从文体改革开始的。胡适在他那篇发难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改良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无一例外，都是文体上的改革。文体改革必然与语体改革相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包含着语体改革。顺理成章，胡适继而提倡“国语文学”。无怪人们习惯于把“五四”文学革命径直称为白话文运动。

① [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②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五》。按：时下《鲁迅全集》版本较多，编排不一，查阅不易，而鲁迅自己编定之书则并无变动，故本书凡引用鲁迅文字，只注集名和篇名，不注《全集》卷数页码。

③ 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

为什么一场划时代的文学革命会以文体改革为突破口？为什么发难者丢出的一石会激起千层浪？是偶然性起作用，还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先听听当事人的意见。

胡适说：“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我也知道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我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它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它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才谈得到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方案。”^①他又说：“我常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②

热烈响应并发展胡适文学改良论的刘半农说：“胡君仅谓古人之文不当摹仿，余则谓非将古人作文之死格式推翻，新文学决不能脱离老文学之窠臼。”^③

连较早指出文字形式改革之不足，积极倡导思想革命的周作人，也承认：“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果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旧小说的不自由的形式，一定装不下新思想。”^④

看来，他们先抓住文体改革来做文章是有意识的，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正因为如此，胡适的文章在当时才会引起广泛的反响。梁实秋后来在《梁实秋论文学·序》中回忆道：“胡适先生的《文学改良刍议》，对我而言，确是发聋振聩，把许多人心目中积存已久的疑惑一下子点破了，我顿时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① 胡适：《逼上梁山》，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9、19—20页。

② 胡适：《谈新诗》，同上书，第295页。

③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同上书，第66页。

④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同上书，第292页。

其实,语体文体并非简单的载体,它与思想内容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语言,作为思想的物质外壳,既可以束缚思想,也可以促进思想;文体,作为内容的表达形式,既可以限制内容,也可以激发内容。在文学史上,审美意识的变化总是同时反映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魏晋时期思想的解放带来形式的创新,而“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则将恢复道统和恢复文统的双重责任同时挑在自己的肩上;太平天国在反对孔孟之道的过程中,严厉申斥了载道的文体,甚至专门发出上谕,严戒浮文巧言,而抗击太平军的统帅曾国藩则在奋卫封建道统时,并提出中兴桐城古文的口号,创立了桐城一湘乡文派。在中国文化史上,封建文统总是维护着封建道统,到了晚清,面临着社会大变革,资本主义新思潮冲击着封建思想,于是文体改革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新文体”的提倡以及“白话文运动”等,相继出台,全面开花。值得注意的是,提倡并实践文体革命的积极分子,如梁启超、夏尊佑、黄遵宪、裘廷梁等人,都并非书斋中的骚人墨客,而是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急先锋。可见晚清文体改革已成为政治改革和思想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正像当时政治改革和思想改革的不彻底一样,晚清的文体改革也是不彻底的。裘廷梁虽然提出过“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但许多人却只把白话文当作借以开通民智的工具,认为宣传性通俗性的文字可以用白话,而高雅的诗文著作则仍须用文言,连提倡“书之所陈,与口说之语言相近”的睁眼看世界的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著作时,用的也还是桐城派古文。梁启超的新文体,虽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①,但就总体而言,无论文辞、章法、笔法、神韵,仍未脱文言格式。小说在我国一向不登大雅之堂,但在晚清却有空前发展。为了宣传、教化之需要,梁启超把小说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似乎无论进行何种社会改革都必须从小说开始。其他论者说得虽然没有梁启超那么绝对,但对小说的重视却是一致的。有些长篇的小说理论,如成之的《小说丛话》,不但对小说研究得相当细致,而且超越了传统的小说论,在美学上有所发挥,将“美的制作”分为模仿、选择、想化(想象)、创造四个阶段,显然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晚清的小说创作也吸收了一些西方小说的技法,如倒叙法,但总体结构和叙述角度并没有超出明清通俗小说的格式,或如《三国》《水浒》式的整体结构,或如《儒林外史》式的集锦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6页。

帖子,而且大抵都是作者站在说书人的角度来叙述全书故事。至于“诗界革命”,则产生了一些满纸堆砌新名词的旧体诗,梁启超不满于这种情况,于是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法,然而依此法写诗,尽管有些新思想,而格调还是旧的。

总之,晚清文体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并没有突破旧文体的硬壳,所以也没有出现划时代的新作品。

“五四”文学革命具有空前的彻底性,不但在思想内容上彻底反封建,而且还创造出崭新的文体,使整个文学创作焕然一新。

“五四”的新文学家们,不再把白话文仅仅作为通俗宣传之用,而要用它来创造整个新文学——国语文学。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都写过为白话文论战的文章,《新青年》杂志全改用白话文,胡适还写了半部《白话文学史》,用来说明“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①。尽管这本文学史写得很偏颇,比如在断限上,上限从汉代开始,而摒弃了先秦文学;在取材上,汉诗只讲民歌而不提文人诗及汉赋,汉文只讲《史记》《汉书》中的白话成分而不及其他,这当然不能反映全貌;在评价上,也多从语体着眼,如初唐大讲“白话诗人王梵志”和寒山和尚,而只“带着论‘四杰’”,这就轻重倒置了,六朝则只推崇陶渊明的田家语,以为“可算得一大革命”,这也难以评出诗人的真价值,但是作者这样花大力气为白话文的存在寻找历史依据,的确用心可嘉。我们与其把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看作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毋宁把它看作白话文运动中论战性的作品。为了给白话文学开辟道路,偏颇是在所难免的。鲁迅甚至把那些“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的人,称为“现在的屠杀者”!^②他后来还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悔改,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③在今天看来,这些话也许有些偏激,但却正表现了先驱者激切的心情。“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就是在他们的披荆斩棘的战斗中成长起来的。

最先进行白话诗尝试的,是胡适。虽然他的《尝试集》里还有许多旧意境旧格式的诗,特别是在第一编中,有些诗实际上是五、七言歌行,如《赠朱

①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引子》,见《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② 鲁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③ 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